

抗日战争与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

一

中国近代史有若干重要篇章，抗日战争是其中极为辉煌的一章。近代历史上的每个篇章，都来自中国社会这时特有的基本矛盾或基本问题。抗日战争同样来自那些基本矛盾、基本问题。我们说，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辉煌的篇章，并没有夸大其词。近代中国那些基本矛盾、基本问题把中国拖进了半殖民地、殖民地的黑暗深渊，困扰、折磨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人。抗日战争不同于其他篇章的地方，是它给中国近代解决那些基本问题开始凿通坚冰，开始打开了前进的道路。

二

中国近代社会矛盾复杂，什么是这段历史上的基本问题？

中国近代史从 150 年前的鸦片战争算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止，共 110 年。这段历史时间不长，内容繁多，变化很大。要了解其间的基本问题，有个简要办法，就是看它同以前以后的社会相比，多了什么，又少了什么。

近代这 110 年的前面是独立的封建社会，后面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在那期间，明显地多了一个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少了一个民族独立；多了一个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统治，少了一个社会工业化、近代化。因此，中国近代史上的基本问题是两个，第一，民族独立问题；第二，社会工业化、近代化问题。

关于民族独立：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独立于世界的东方，政治上、文化上对周围地区广有影响。英国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中国大门之日起。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在战争中遭受失败，割地赔款，受到不平等条约束缚。民族不独立了，社会开始逐渐走上半殖民地道路。民族矛盾从此成了社会生活里的基本矛盾之一。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接着来的英法联军之役，带来了更加严重的后果。中国封建统治势力再次向外国屈服，签订一系列新的不平等条约。清政府作为侵略者的工具的地位确定下来。清政府站在人民的头上发号施令，外国侵略者则站在它的头上发号施令。再往后 30 几年，即到 19 世纪最后 10 年、特别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完全变成了帝国主义瓜分的对象，亡国的危险迫在眉睫。英国、法国、俄国、

日本、德国、美国是这时侵略中国的主要帝国主义。它们都要求在瓜分中国中得到自己的份额。1904年出版的《外交月报》举出30件事，说明过那种情形。30件事里面，有全国税务属于英国，东清铁路属于俄国，粤汉铁路属于美国等等。中国的广大地区这时被列强划作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国不能自主。一直到1936年即抗日战争前夕，中国的18个城市辟有外国租界或租借地，中国领土上驻有日、美、英、法、意诸国军队2.8万多人。中国早已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生活在外国军队的监视下面。

帝国主义侵入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地位，也直接改变了中国广大人民的生活状况。以前中国人民只受本国封建势力压迫剥削，现在又加上了一层，同时要受外国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人民因此被迫要抵抗外国侵略，掀起反抗斗争和起义。整个近代史上反抗斗争连绵不绝，第一位的症结就来自这里。

有一种观点，认为近代中国所以落后，在于“动乱太多”。国家只有安定才能进步，近代中国太不安定，所以落后了。乍一听，似乎不无道理。分析一下，就知道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第一，我们对于近代中国的所谓“动乱”，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看待。它们中间有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头上的，如鸦片战争以下的各次侵略战争，有民国以后旧军阀、新军阀混战和国民党进行的反共内战，有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的起义，如太平天国、辛亥

革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存在，那些“动乱”就是不可避免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单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一项，占的时间就很长。从鸦片战争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包括英军进攻西藏、日本两次出兵山东与“九·一八”占领东北等，列强侵略中国的战争共12次，历时16年又9个月。也就是说，近代中国每10年中，就有一年半的时间是在外国侵略者发动的战争动乱中度过的。新、旧军阀混战、国民党的反共内战，也与帝国主义的参与或者支持分不开。如果“动乱太多”影响了中国的进步，要算这笔账，首先应该算在帝国主义头上，其次要算在中国反动统治者头上，算不到人民头上。第二，中国人民抵抗外国侵略、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不是有过，而是有功，有最大的功。他们进行的斗争，不是加速了民族丧失独立，而是挽救了国家民族沦于灭亡；不是促使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而是阻止了中国变为殖民地。就拿本身带有很大落后性的义和团运动来说，义和团发生在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一举打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1908年，孙中山讲过他与西方某人谈话的故事。孙中山说，列强怀有瓜分中国的野心，对方回答说，那是义和团以前的事情，义和团使情况大变了，如今再谈论瓜分中国，那是不识时务。从西方人的评论可以看出，义和团运动建立了何等巨大的历史功绩。用表面的所谓“动乱太多”去说明近代中国的落后，只会使人认不清事实真相，是混淆是非。它实际的意思是说中国革命革错了，人

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反抗封建统治反抗错了。此说甚谬，不可不察。

正由于争取民族独立是近代中国的一个根本问题，人们经过斗争实践，在认识和感情上把两个相联系的概念突出起来了，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观念与爱国主义的观念。它们虽然各有其历史来源，但只有在这时才内容一新，表达了新的使命感。帝国主义越是侵略不已，它们就越是深入人心，由一种思想观念，变为最大的凝聚力量，人们由此能够团结起来，不怕牺牲去战胜敌人。中华民族的观念与爱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给我们创造和留下的至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新的时代条件将使它们更加丰富。

关于近代化：近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从落后的封建社会进到工业化，是与资本主义分不开的。中国封建经济相当发达，走上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还没有来得及露头，就受到了外国侵人的沉重压制。中国的近代化由此陷入了困境，多灾多难。

我们要指出，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起过刺激和促进作用，那是事实。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促使封建经济解体，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创造了某些条件和可能，例如机器设备输入，技术引进等。外国既然要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利用中国作为倾销产品的市场，就必须把某些设备、技术带进中国，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不那样做是不可能的。然而外国侵人的本来目的，不

是要听任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变中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奴役压榨中国人民，是要阻止中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阻止中国实现国家工业化。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这样做更是不可能的。

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冒出地面，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这时洋务派在统治集团中掌握重要的权力。他们主张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引进外国技术来维护封建阶级的统治地位，但也害怕一旦机器满天下，富商大贾仿照外洋机器生产牟利，对封建制度就有更大的危险，因此层层加以限制。到 90 年代这种情况有了一些改变，封建势力仍旧不愿意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康有为在著名的公车上书里向清政府建议，要“富国为先”，“以商立国”，要废除限制人民利用机器、开设新式企业的禁令，要准许并鼓励商人用机器自行开采矿产，制造各项器用，兴办各种近代企业等等。90 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一些增长，外国在中国办的产业则有了更大的增长。据经济史家的研究，中国产业与外国产业资本的比例是，1894 年中国占 39.3%，外国占 60.7%；1913 年中国占 19.7%，外国占 80.3%；1936 年中国占 21.6%，外国占 78.4%。外国资本远远超过中国资本。不仅如此，外国资本是商业掠夺性的，它依靠帝国主义的特权，利用投资获取最大的利润。中国资本根本没有力量竞争，处处要仰外国资本的鼻息，求得生存。中国的工业中主要又是轻工业，重工业几乎等于零。以钢为例，1936 年全国除东三省外，钢的产量不

足五万吨。1949年全国钢产量也只有15.8万吨，相当于英国19世纪初的水平。中国近代工业的状况就是如此。科学、文化、教育的落后人所共知。政治黑暗，没有民主，更不待言。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没有实现近代化，和对外开放不够有关吧！这个看法完全不合事实。中国门户固然不是自己对外开放的，但它早已被帝国主义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海关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外国人自由地在中国开设银行、工厂，列强的兵舰商船自由地在中国海岸内河航行，列强的军队驻扎在中国土地上，中国的广大地区成了列强的势力范围，而且一国得利，各国均沾。试问还要怎么开放法？问题在于那种开放，不是独立国家的开放，而是丧失了独立的半殖民地的开放。处在那种开放下的社会，只有被无止境的搜刮勒索变得越发贫穷落后，生产凋蔽，民穷财尽，而不会产生什么近代化。孙中山说中国是“次殖民地”，比殖民地还次一等，就是指的这种情形。我们知道，殖民地对宗主国绝不存在开放与否的问题，可是世界上哪个殖民地是不落后的，是近代化了的呢？近代中国对外门户洞开，但是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各种方式的搜刮压榨下不得翻身，这正是表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

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独立与近代化，这两个基本问题是什么关系，又如何去解决呢？

民族独立与近代化，不是各自孤立的，它们紧密地联

结在一起。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1949年，毛泽东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那就是解决近代化问题了。但是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它们各有各的特定内容。民族独立是要改变国家民族被压迫的地位，推倒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近代化则是要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地位，要发展以近代工业生产为主干的社会生产力。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生产力的问题。两个问题的内容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一样。人们无法来实现两个任务同时并举，或者毕其功于一役。那么，先从发展工业、发展资本主义入手，实现中国的近代化，然后去解决民族独立问题，行不行？人们不是没有这样想、这样做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物质救国的主张者，都从这方面做过了努力。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在辛亥革命以后并且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浪潮。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帝国主义重新加紧对中国控制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转瞬即逝了。中国的民族压迫依旧，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这说明此路不通。剩下的惟一解决办法，就是走革命的路，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取得民族独立，给中国实现近代化打开新的天地。历史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行进的。而且终于走通了。这说明它

是一条惟一正确的道路。

以前我们把中国近代史叫做“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民主革命”里面有民族独立的要求，没有直接的近代化的要求。这当然不是表示革命者们不要求实现近代化，而是表示他们知道中国的近代化要从解决民族独立问题来突破难关。难关一旦克服，中国实现近代化的办法就形成了，前进的道路就打开了。中国近代历史曲折地走过了110年，就是大声告诉了中国人这么一条道理。

三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为争取解决近代中国民族不独立，社会未能工业化、近代化这两个基本问题进行的长期斗争的继续。以前那些斗争基本上都失败了，但也各有地位，不可忽视。为什么只说抗日战争为解决近代历史上的两个基本问题凿开坚冰，打开了前进的道路呢？这要对抗战的时代环境、结果作具体考察。我们的研究对此已经作过不少考察。如果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抗日战争准备了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决战，开辟了新中国代替旧中国的现实可能性。

这种准备、这种可能性，一是中国近百年间第一次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全面胜利，突破了争取民族独立的重大难关；二是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决定性改变，出现了一个代替旧中国的新中国的前身。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共产

党领导的解放区有了一亿人口，100万军队，200万民兵。这些解放区北起长城内外，南至海南岛。它们地区分散，政治领导、社会制度、斗争目标统一。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新中国的政治纲领、奋斗目标，大部分也就是解放区已经和正在施行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和经济文化建设奋斗目标。新中国必须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一个人民享有民主自由、便于社会生产力长足发展的国家。在解放区人民政权下，一没有外国干涉者的地位；二没有封建统治的地位。中国近代历史上两个基本问题，这里都不再存在了。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没有新中国的名号，完全具备了新中国的资格。解放区不是一个国家，它实质上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由此可见，抗日战争八年，是中华民族突破取得民族独立难关的八年，是历史为争取新中国到来做了现实准备的八年。

然而有了准备和可能性，并不见得一定就能变为现实，或马上就能变为现实。抗日战争结束，共产党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准备与国民党继续合作，从事国家的和平民主建设。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签订的《双十协定》上，也承认双方要坚决避免内战，合作建立独立富强的新中国。但蒋介石坚持要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他只许存在一个继续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旧中国，绝不允许它变成一个民族独立、人民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抗战后期，美国在中国的政治军事势力

膨胀，扶蒋反共，控制中国，成了美国准备在战后与苏联争霸的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蒋政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对日本侵略者作战，如今变成了在美国出钱出枪支持下，向人民手中夺权，实行“戡乱”。蒋这时拥有多达几百万装备优良的军队，又有美国的大力撑腰。看样子，很可能只需要不长的时间，就可以一举摧毁共产党和人民力量。蒋并且把刚刚投降的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起用任命为自己的军事顾问，招集日本军官秘密训练打内战的军队。同时，共产党还受到来自另一方面的压力干扰。抗战一结束，斯大林就郑重其事劝告共产党要与蒋介石达成妥协，参加蒋政权，解散自己的军队；并断言“中国起义的发展是没有前途的”。当此时也，一场新的严重斗争，前面是新中国还是旧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两个基本问题能不能就此解决，仍然存在两种可能性，而非一种可能性。共产党独立自主，排除国内国际各种干扰，力破万难，经过四年的人民解放战争，把统治中国 22 年的蒋政权推倒了。它直接推倒的是一个政权，但不止是一个政权。那个政权的外貌不尽同于鸦片战争以后的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其实质是前者的继续。它体现的是统治了中国 110 年的社会制度，社会秩序。近代中国的两个基本问题就来自这个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秩序。论军事实力，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但数量远处于劣势，而且只有“小米加步枪”。仅以短短四年就推翻了一个实力强大得多的蒋政权，根本原因何在？当然并非蒋介石、国民党没有运用一

切能够运用的力量和手段来进行反对共产党的战争，更非美国政府没有做出最大的努力来支持蒋政权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1949年8月美国政府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上说得很明白：“中国内战所造成的总结果，系在美国政府控制能力范围以外，此乃一不幸而不可避免的事实。此一结果，绝非美国在其能力之合理范围以内所已采取或可能采取之措施所能予以变更，亦非由于美国政府未采取某项措施所致。此一结局，乃中国若干内部力量所造成，美国曾对该力量力谋予以左右而无成”。^① 白皮书说了大实话。美国为了阻止中国革命进程，保住蒋政权不被推翻，做了最大的努力，但未能奏效，事与愿违。其中所说的造成此一结果的“中国若干内部力量”，美国曾采取种种措施，力谋予以变更，予以左右的“该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战争坚持顶住美国的公然干涉，也顶住斯大林从自我利益出发的劝告，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是历史事实。但这决非凭共产党一个党所能单独做到的，这是凭它与人民站在一起，受到人民的支持才能做到的。中国人民在110年里，积累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经验，在关键时刻，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共产党所指出的中国的前途。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民族为争取民族独立所突破的最大难关，解放战争胜利，是这方面突破的最后一道难关。历史的运动于是宣告成一段落，由抗日

^① 艾奇逊：《中美关系》白皮书序文。

战争为解决中国近代历史上两个基本问题凿开的坚冰，如今消融了；抗日战争为新中国代替旧中国开辟的可能性，如今变成了现实。它的标志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其根本作用是什么？司马迁回答说，它的根本作用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的时代，是章太炎称之为“神人大巫”的董仲舒今文学当道的时候。所谓“究天人之际”，是说探究天道与人事之间某种神秘关系，反映了董仲舒思想影响，自不足取。说历史学的根本作用是“通古今之变”，则是凿开混沌的深刻认识。据说修订过《春秋》、编纂过《左传》的孔子、左丘明（近代人对两者均有异议）没有讲过，西方“历史学之父”西罗多德也好像没有讲过。“通古今之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从历史古往今来，它的前天、昨天、今天的不断演变，不断发展，来认识它的内在矛盾，因果关系，前进方向与客观规律性。司马迁不可能像我们现在讲得这么明白，但他把人们所以要了解历史，归结为“通古今之变”，确实是深刻的。时至今日，有的论著讲历史学有这样那样的作用，就是忘记了它最重要的作用是告诉人们从历史古往今来的不断变化中认识历史的矛盾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基本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国近代历史上“古”与“今”最根本的变化，就是中华民族独立了，中国迈向近代化的道路敞开了。关于民族独立，从150年前开始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世界列强，如今不再是与旧中国

那样的关系了。再过四百几十天，英国就要把香港交还中国了。日本政府首脑去年“八·一五”对日本侵略中国表示了道歉；前此，日本天皇也特地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俄国与中国的关系，现在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两国边界条约和一系列有关协定的签订，把双方的关系建立在长期互利合作基础上了。德国、法国与中国早已不存在任何历史遗留问题，彼此的交往是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交往。惟一例外是超级大国美国在全球推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订下“遏制中国”的政策，对中国动不动就施加横蛮干涉威胁，尽管多半也未能得逞。不用说，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算核俱乐部一个成员。这就是中华民族今天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和状况。关于国家工业化、现代化，中国要赶上发达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小康已经在望，举世共认，不需要细叙。奇怪的是，美国用霸权主义对待别国，近来又伙同其他一些国家的舆论，宣传“中国威胁论”。这当然全是出于虚构。但它的反面又确实含有真实性，那就是中国民族独立，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了，使怀着侵略中国野心不改的人们感到了深为不安。所有这一切，集中到一个焦点，中国获得民族独立、打开通往现代化道路的变化，直接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再往上追溯，则是来自中国近代历史发生转折的抗日战争。认识当代中国的地位，必须掌握近代中国历史上两个基本问题的这种“古今之变”，通晓这个“古今之变”的动力来自何处。

近代历史去今未远，照理说不容易任人随意曲解与公然颠倒。其实不然。只要能够用来实现某种目的，条件环境许可，不管何时的历史，都难免被人胡编乱造。近来一些论者，否认帝国主义侵略使中国丧失了民族独立。他们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西方的侵入，主要是提出了中国近代化的任务。意思是说，对帝国主义入侵不能反对，只可欢迎。又一些论者，对于从林则徐抗英、农民起义、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无不一一贬低或否定之。他们说，阶级斗争，反侵略史观，“对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的确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如此等等，粗略划分一下，大概可以看作两类。一类是继续和扩展40多年前，艾奇逊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时所说的不存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只有“外来者”给中国“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举世无双的技术”之类。目的是替侵略者辩护，制造蛊惑人心的舆论。跟它们谈不上学术讨论，那属于目前市场经济中所说的“打假”问题。再一类，是那些论者，或发表“新哲理”、“新观点”，或赶时髦，或对矛盾的事物无力分析，或者闻风而动，人云亦云。对于这一类，最好集中若干问题进行讨论，例如中国近代史上是否存在民族不独立，社会缺少工业化、近代化两个基本问题；这样的基本问题与外国的侵略、中国的封建统治是什么关系；如果没有民族运动、革命斗争，中国依靠什么力量来改变自己多灾多难的命运；新中国诞生是斩断了两个基本问题作孽的过去，还是继续

着它的过去，等等。只有严肃的讨论，才会给人们带来严肃的“说法”。

黑格尔《小逻辑》上说，人的认识不贵在能够区分显而易见的事物，而贵在区分事物的细小差别。比如说，区分一支笔与一个骆驼，谁也不会说此人有了了不起的聪明；如果能够分辨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虽然还谈不上高明，也算比较聪明些。黑格尔的目的是要说明人的认识贵在能够区分异中之同，同中之异。其实他还应该说一声，人在辨别橡树与槐树之类以前，首先要能够辨别笔与骆驼，不然的话，橡树、槐树也难保不变为苍狗白云。有关上述近代史的种种议论，我想首先应该先区分清楚哪是一支笔，哪是一个骆驼。